



狄更斯：

为人道而战的伟大作家

赖干坚 ◎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狄更斯：

为人道而战的伟大作家

赖干坚 ◎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狄更斯:为人道而战的伟大作家/赖干坚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615-5373-2

I. ①狄… II. ①赖… III. ①狄更斯, C. (1812~1870)-人物研究 ②狄更斯, C. (1812~1870)-文学研究 IV. ①K835.615.6 ②I56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8160 号

官方合作网络销售商: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总编办电话:0592-2182177 传真:0592-2181253

营销中心电话:0592-2184458 传真:0592-2181365

网址:<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970 1/16 印张:18.5 插页:2

字数:328 千字

定价:4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 一、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的内涵与特点 1
- 二、人道主义是狄更斯批判现实的思想武器 4
- 三、人道主义是狄更斯追求道德理想、社会理想的精神动力 7
- 四、人道主义赋予狄更斯创作张力和魅力 10

第二章 狄更斯创作的主导精神 13

- 一、聚焦道德的社会批判 13
- 二、追求人生理想的执着精神 17
- 三、贯彻始终的乐观主义 20
- 四、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 25

第三章 人道眼光审视下的二元对立世界 30

- 一、善良与邪恶的较量 30
- 二、人性化世界与金钱世界的对立互动 37
- 三、圣诞精神对商业精神的胜利 49
 - 《圣诞颂歌》展现的两个对立互动的世界
- 四、正义与邪恶的交锋 56
 - 《小杜丽》的人文意涵

第四章 苦难与救赎母题彰显的救世情怀 75

- 一、对可怜无告者的关爱与拯救 75
- 二、对受压迫的劳苦大众的关爱与拯救 86
- 三、迷途者的救赎 99

第五章 混沌世界的人生理想 105

- 在现实与幻想的碰撞、融汇中探寻人生理想
- 一、匹克威克和布朗洛的世界：狄更斯早年营造的“乐园” 105
- 二、“乐园”的丧失：《老古玩店》的象征意味 110
- 三、重建“乐园”的幻想与幻想的破灭 112
- 四、独善其身：也算一种人生理想 114

第六章 人道眼光审视下的爱情与婚姻 116

- 一、反人道的爱情与婚姻 116
- 二、情场失意者的悲剧 125
- 三、情投意合的爱情与婚姻 131
- 四、社会动荡时期的爱情与婚姻 139

第七章 人道精神的大众情结 142

- 一、狄更斯的大众情结与其人道主义思想 142
- 二、大众情结赋予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鲜明的特征 146
- 三、体现大众情结的创作风格 152

第八章 人道精神的道德眼光 160

- 一、从人道精神出发揭示社会弊端 160
- 二、以道德眼光审视社会问题 162
- 三、重振道德的终极目标：追求人性的完善 167

第九章 人道精神主导下的人物塑造 170

- 一、善恶分明的两极世界 170
- 二、从奥利弗与匹普的形象比较看狄更斯的人物塑造艺术的发展 186
- 三、巾帼胜于须眉：狄更斯笔下的女性英豪 192
- 四、“厌世者”的新生 195
 - 狄更斯笔下的“多余人”形象
- 五、对人类恶习 200
 - 虚伪的挞伐：狄更斯笔下形形色色的伪君子形象
- 六、独特的人物塑造艺术 205

第十章 与人道精神相呼应的叙事艺术 226

- 一、现实与幻想融合的叙事途径 226
- 二、寓庄于谐的叙事风格 248
- 三、作者主体性的或扬或抑与叙事方式的变化 285

结 语 狄更斯的永恒魅力 290

后 记 292

第一章 绪论

一、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的内涵与特点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狄更斯不仅继承了欧洲传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而且改造、吸收了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思想。可以说，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世俗的人道主义与宗教的人道主义的融合。

我们知道，狄更斯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他像托尔斯泰一样，不相信官办教会，尤其厌恶宗教的派系之争，他把《新约全书》的精神奉为立身处世的圭臬，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谆谆嘱咐儿女要按照它的教诲做人。所以，实际上，“狄更斯是以宗教信仰为精神支柱的道德家。英国基督教传统对他的幻想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可是，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狄更斯吸收并改造了他的宗教思想，使之成为完全不同于正统的神学或作为一种仪式来行使的东西。正是宗教的冲动驱使他试图把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精神加以升华，把它注入到他虚构的一个更有人性的世界的渴望中去”。到了晚年，狄更斯清醒地认识到：“要是没有成为个人的心灵的善良仁慈，单有社会性的善良仁慈是不够的。心灵必须受到陶冶，使它变得仁慈，这个过程就是从奇里伯们的

慈善发展到自我的认知和领悟。”^①

人道主义与宗教思想的融合，“从更为客观的角度来看……狄更斯所表达的是宗教感情与作为维多利亚时期道德思想基本面的人文关怀的结合”。^②

那么，人道主义与宗教思想在狄更斯那里如何结合呢？狄更斯吸收了宗教思想中哪些成分，又改造了它的什么呢？

显然，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狄更斯是以西方世俗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为他的精神支柱的，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对人的善良本性、人的理性精神和高贵品德的肯定，关于人应有同情心、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反对人对人的压迫奴役的观念，成为狄更斯思想的基本成分和主导精神。在这基础上，他吸收了基督教倡导的仁慈、博爱思想，并且把耶稣基督当作一个完美的人来崇敬，认为基督为拯救世界牺牲自我的精神令人敬佩，值得仿效。但是，狄更斯摒弃了基督教关于“人性恶”的“原罪说”，而像维多利亚时期的许多英国知识分子一样，遵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自然人性”说，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邪恶是人类腐败的文明的产物。

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具有时代的特点和个人的特点。

狄更斯所处的时代，英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这是新旧交替时期。在农村，自耕农的土地不断被大地主和农场主兼并，失去土地的农民涌进城市，成为工业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在伦敦，这个当时的世界大都会里，城市贫民、流浪者激增，东区的贫民窟成为疾病和犯罪的滋生地。日益兴盛的煤矿业大量雇用童工，成为当时矿业的一大问题。随着经济的发达，科学技术突飞猛进，1851年伦敦举办了世界首届科学技术博览会。

① 约瑟夫·戈尔德《查尔斯·狄更斯——激进的道德家》，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第276页。引文中所说的“奇里伯们”指的是狄更斯早期的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那对心地善良的富商奇里伯孪生兄弟。他们原先很穷苦，经过多年艰苦打拼，挣得一份可观的家业，开了一家大公司。他们发财后，仍保持早年纯朴善良的本色，乐于助人，热心慈善事业，并且富于正义感，敢于和邪恶势力做斗争——笔者。

② 丹尼斯·沃尔德《狄更斯与宗教》，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公司，1881年，第6页。

陆地交通出现了火车，但马车并未绝迹。江河和海洋上出现了汽船，但还有帆船在行驶。

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新思潮，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宗教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动摇了宗教的统治地位。这时期，虽然封建贵族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有强大的势力，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1832年实施的议会改革法案，使工商业资产者的代表进入了议院，分得了政治权力的一杯羹。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巩固，资产阶级的壮大，财富迅速集中，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繁荣富裕的景象伴随着衰败的局面和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这是新与旧交替的年代，是挑战与机遇、希望与危机、新生与衰亡并存的年代，也是催生文学巨人的年代。狄更斯就是应运而生的文学巨人。他肩负着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以宗教的虔敬情怀，直面人生，以其独特的浪漫与写实融合的艺术方法，鞭挞邪恶与腐败，讴歌善良与美德，既揭示社会的阴暗面，又展现其光明的前景。总之，狄更斯恪尽一个人道主义作家的职责，把时代的危难与希望、苍生的痛苦与福祉尽收笔底，以其栩栩如生、勾魂摄魄的艺术画卷展现了一个新旧交替的动荡不安的时代，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痛苦与希望。

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又具有独特的鲜明的个性。

首先，狄更斯的人道主义带有激进主义和民主主义特点。狄更斯从小经受生活的磨难，年纪轻轻就有丰富的阅历，他对社会情况，特别是下层民众的苦难有比较广泛、深切的了解，和劳苦大众有着天然的、密切的感情。他不仅真诚地同情他们的苦难，而且自觉地充当他们的代言人，向压迫他们、剥削他们的贵族资产阶级发出强烈的抗议。

其次，狄更斯的人道主义具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狄更斯不仅怀着强烈的义愤揭露社会黑暗，批判邪恶、残暴，而且以巨大的热情展现光明，讴歌善良仁慈。狄更斯绝不是个虚无主义者，他从没把社会现实看得漆黑一团。

哪怕是在他的晚年，当他面对极其黑暗腐败的现实，被险恶的环境逼得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仍看到人们心灵中善良的火花和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对未来并没有完全丧失信心。

再次，狄更斯的人道主义带有实践性，他绝不是把善良、仁慈只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的空谈家，他努力把自己的人道主义主张付诸实践。他是个著名的慈善家和社会公益事业积极的倡导者、参与者。他是善良、富裕的贵族后裔库茨小姐的挚友，是她的慈善事业热心的合伙人和谋士。他协助库茨小姐创办“失足妇女感化院”，并且参与库茨小姐创办的贫民子弟免费学校的管理工作，努力改善学校的设施；他还参与了库茨小姐关于清除伦敦贫民窟、建造大批廉价出租房的宏伟计划。他又和朋友一道组建了文艺家协会，并且筹集资金，为事业有成、生活拮据的作家、艺术家提供生活保障。有一次，狄更斯出外旅游，在火车上听到一位正在看报的绅士和他的同伴谈论作家道格拉斯·杰罗尔德死亡的消息。杰罗尔德是狄更斯的朋友，狄更斯知道这位作家平日生活极其困难，死后不可能留给家属什么钱。于是，他立即行动起来，通过演说、戏剧义演，筹集了2000英镑，赠给杰罗尔德的家属。据狄更斯的传记作家透露，狄更斯平时经常向医院和慈善机构捐款，可他从不向外界张扬，甚至对自己的家属也不说。狄更斯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的高尚情怀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狄更斯的可贵之处主要不在于他在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上的辉煌业绩，而在于他把人道主义化为自己的血脉、人格力量，贯注于他的创作之中，将其作为小说创作的灵魂和特质。

二、人道主义是狄更斯批判现实的思想武器

作为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批判现实的唯一武器就是人道主义。他之所以要批判现实，是因为他认定，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非人道的、

黑暗的现实，他希望通过创作对黑暗现实进行批判，使社会变得符合人道主义精神。

随着狄更斯对社会认识的逐渐深入，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变得越来越深刻、丰富，他对现实的批判也就越来越尖锐。

早在狄更斯刚开始创作时，他就在一系列社会小说中揭露了种种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在他的第一部小说《匹克威克外传》（1836—1837年）中，他揭露了诉讼律师如何玩弄司法、胡作非为，并且描写穷人因还不起欠债而在负责人监狱里受罪的惨状。在《雾都孤儿》（1837—1839年）中，他揭露了贫民习艺所虐待孤儿的可怕情景以及伦敦东区贫民窟令人震惊的状况。在《老古玩店》（1840—1841年）中，他揭露了高利贷者如何丧心病狂，迫使古玩店的店主和他的外孙女家破人亡的残忍行径。在《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8—1839年）中，他揭露了私立学校办学牟利、摧残儿童身心健康的黑暗内幕。

狄更斯在上述作品中，以极大的义愤控诉现实的黑暗，揭示了种种令人发指的败行恶德，对受苦受难的下层民众表现出深切的关怀、同情。若问狄更斯揭露的这些黑暗现象是怎么产生的，作者在作品中提供了答案：首先是社会机构的腐败。比如贫民习艺所的可悲状况，是由于这个机构本身是英国资产阶级议会通过的新济贫法的产物。这个新济贫法完全是压制、迫害穷人的法律，它表面上是救济穷人，实际上让穷人在贫民习艺所里吃不饱，却要干沉重的活，迫使他们在这种形同慢性自杀的生活中消亡。其次，狄更斯认为，种种黑暗现象也是邪恶之徒的败行恶德造成的。比如，贫民习艺所本是迫害穷人的机构，而主持这个机构的大小官员和工作人员又个个像是凶神恶煞，与习艺所里的穷人、孤儿为敌，并且处心积虑地通过克扣他们的生活费自肥。若问狄更斯：这些人怎么会这么狠心、这么残忍呢？狄更斯并不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他倒相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坏蛋不是天生的，而是在腐败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是沾染了社会恶习，善良的天性受到侵害、扭

曲的结果。这表明，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是性善说的人性观。明确这点很重要。因为狄更斯不仅以他的性善说人性观为准绳去观察、表现社会上的种种违背人的本性的败行恶德，而且他要让“浪子回头”，让那些可能挽救的邪恶之徒迷途知返，回归人的本性，以达到改善社会、实现道德理想、重塑民族精神的目的。

早期的狄更斯可以说是以抽象的人性观去观察现实、表现现实的。所以难怪我们读了他早期的作品之后，总觉得这些作品虽然揭露了种种丑恶现象，提出了若干重要的社会问题，但是似乎没有揭示资本主义的实质问题，没有挖到社会的病根。

狄更斯中后期的作品，情况就不同了。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狄更斯创作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贵族资产阶级及其统治机构。狄更斯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使金钱势力成为主宰英国社会的力量。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像毒菌一样在社会上蔓延开来，侵蚀着善良的人性，使原本富于诗意、美好的人类感情淹没在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污泥浊水之中。狄更斯意识到，资产阶级推行的商业主义是英国社会道德沦丧、社会日益非人性化的根源，社会现实离他的人道主义理想已越来越远。这一时期，他接连创作了《马丁·瞿述伟》（1842—1844年）、《圣诞颂歌》（1843年）和《董贝父子》（1846—1848年），集中揭露批判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这些作品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已使资产者的人格资本化，使他们丧失了正常的、健康的人性；对金钱的强烈贪欲和疯狂的利己主义不仅毁了他们的生活，毁了他们的家庭，而且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尔虞我诈。

狄更斯19世纪50年代的几部作品进一步深化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艰难时世》（1854年）第一次反映了尖锐的劳资矛盾。作品中的工厂主、银行家庞得贝完全不把工人当人看待，他称工人为“人手”，就像古希腊的奴隶主把奴隶称作“会说话的工具”一样，庞得贝只把工人看作给他的资本增值的工具。他残酷地剥削工人，完全不顾工人的死活，却口口声声说他

给予工人的待遇够好了；工人稍有不满意，他就责怪他们不知足。作品中的另一位资产者，五金商人兼国会议员葛擂梗更把资产者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上升为“事实哲学”。在他眼里，凡是和买卖无关的东西，比如情感、幻想之类都是要不得的，人生最重要的是能带来利益的“事实”，就是买卖以及和买卖相关的科学，等等。他认为，一个人从出生到死所有关系就是隔着柜台的买卖关系。假如天堂里没有和买卖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那么，这个天堂也不是他们所要的。另两部作品《荒凉山庄》（1852—1853年）和《小杜丽》（1855—1857年）则进一步揭示了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统治机构反人民、反人道的实质。《荒凉山庄》揭露了英国司法机构如何为贵族阶级利益服务，残害人民大众，导致整个社会暗无天日的恶行。《小杜丽》则进一步揭示了英国负债人监狱对人的灵魂的腐蚀；最高统治机构惊人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对民众利益漠不关心；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和统治者如何里外勾结，欺骗、压榨广大人民，使整个社会像一座大监狱。这两部小说是狄更斯创作中对贵族资产阶级揭露最深刻、批判最尖锐的作品。

三、人道主义是狄更斯追求道德理想、社会理想的精神动力

狄更斯不仅从人道原则出发，揭露批判反人性、反人道的黑暗现实，而且在人道主义精神鼓舞下，积极追求道德理想，探寻精神家园，希望实现符合人道原则的、人性化的社会。

他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对精神家园的探寻，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也就是创作早期（19世纪30年代后半期），狄更斯着眼于善恶对立的原则，表现以善良的富人为主的正直的人们与冷酷自私的邪恶之徒之间的斗争，结果是，为非作歹的恶棍受到惩罚，受磨难的无辜者为善良的富人拯救，过上幸福的生活。表现这一人道主义理想最突出的是他的富于浪漫气息的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作品主人公尼古拉斯·尼克尔

贝是个破落乡绅的儿子，他父亲去世后，兄妹俩陪伴母亲来到伦敦，投奔伯父拉尔夫。拉尔夫是个贪婪自私的商人，不念亲情，对他们极其冷漠。尼古拉斯被安排到乡下一所私立的儿童寄宿学校当助理教师。校长斯奎尔斯是个奸诈自私、不学无术的商人，他把办学当作牟利的事业，用各种办法向学生的家长敲诈钱财，却给学生提供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和低劣的教学，并且动辄打骂学生。校长的妻子和女儿也很粗俗野蛮。尼古拉斯反对他们虐待学生的行径，和他们恶斗了一场，随后离开了这间私立学校。他先是在伦敦，然后到外地流浪谋生，在一个剧团里混得很不错。因他妹妹在伦敦遭到几个心怀叵测的贵族的纠缠，他不得不离开剧团，回到伦敦，解救妹妹。正当他陷入生活无着、求职无门的困境时，遇到善良的富商奇里伯孪生兄弟。他们原本是穷苦出身，经过多年打拼，挣得一份可观的家业。尼古拉斯被安排在他们的公司工作，还得到一座租金低廉的住房，从此一家人过上安定、舒适的生活。尼古拉斯爱上一位才貌双全的姑娘。姑娘的父亲疾病缠身，又欠了犹太高利贷者一笔债。那个又老又丑的犹太商人，要他以女儿抵债，还串通尼古拉斯的伯父拉尔夫逼姑娘的父亲答应。其实，犹太老头并不好色，而是想霸占姑娘将要继承的一份可观遗产，那是姑娘的外祖父遗留给她当嫁妆的。对这份遗产，不仅姑娘本人，而且连她的父亲也一无所知。犹太老头窃取了遗嘱和有关的法律附件。尼古拉斯劝姑娘别答应这门婚事，但她为了挽救父亲，违心地答应了。临近婚期时，存放遗嘱和文件的盒子被犹太老头的女管家偷走了。在善良的商人奇里伯兄弟支持下，尼古拉斯等人识破了犹太商人和拉尔夫的阴谋，不仅夺回了遗产证书，而且把犹太商人和他的合谋者告上法庭。尼古拉斯还救出了受迫害的姑娘，和她结为夫妇，并把妻子名下的那份遗产当作投资的股金，从此成为奇里伯公司的合伙人。

从上述故事看出，在第一阶段，狄更斯不仅把善良的富人看作社会贤达、道德楷模，而且认为他们是弱势群体的救助者、社会正义的主持者。这表明，在狄更斯眼里，中产阶级的优秀人物是他实现人道主义道德理想的擎天柱。

第二阶段是19世纪40年代,也就是狄更斯创作的转折时期。如前所述,这时期狄更斯认识到,资产阶级推行的商业主义是滋生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温床,是造成社会非人性化的根源。所以,在40年代以后,尽管他对中产阶级的优秀分子仍存希望,但他的目光已逐渐转向下层民众。他认为,尚未受到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毒害的下层劳苦大众,仍保持善良的天性。他说:“只要对穷人稍有了解的人,没有一个不深为他们的忍耐精神,不为他们在劳动中,在苦难的日子里,以及死神降临他们头上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毫不犹豫地帮助别人的美德所感动。”^①

狄更斯把中产阶级优秀人物的善良、同情心和社会正义感以及下层劳苦大众的忍耐精神、乐于助人、大公无私的优良品质汇集成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哲学。因为它很切合圣诞节那天基督教所倡导的乐观、开朗、和谐、仁慈、宽容的圣诞情怀,所以,这种人生哲学被称为“圣诞精神”。它和重物质、重金钱、重个人利益、轻感情的“商业主义”相对立。在狄更斯看来,商业主义使人沦为金钱的奴隶,败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圣诞精神则使人向善、心灵净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和谐融洽。寓言式的中篇小说《圣诞颂歌》和带有家庭小说特点的长篇小说《董贝父子》便展现了圣诞精神与商业主义的对立较量,凸显了沦为金钱奴隶的金融资本家斯克鲁奇和商业巨子董贝是如何在圣诞精神的感召下实现人性的复归的。

第三阶段是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也就是狄更斯创作的后期和晚期。面对人欲横流、贵族资产阶级的统治极端腐败黑暗的情境,狄更斯倡导的“圣诞精神”表现为“独善其身”或“舍己为人”的处世态度。在《艰难时世》中,纺织工人斯蒂芬反对老板庞得贝对工人残酷无情的态度,同时又反对工会领袖煽动工人对老板展开斗争、实行罢工的做法,主张劳资双方要互相谅解,彼此要以仁爱之心对待对方。在《双城记》(1859年)中,法国贵

^① K. J. 菲尔丁编《狄更斯的演说辞》,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1960年,第24页。

族后裔达奈反对父亲和叔父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剥削，主动放弃贵族爵号和财产继承权，流亡英国，过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远大前程》（1861年）中，铁匠乔·葛吉瑞和穷苦出身、自学成才的农村姑娘碧蒂，不赞成匹普一心要成为绅士、努力往上爬的生活态度，自甘淡泊，过着自食其力的纯朴生活。斯蒂芬、达奈、葛吉瑞、碧蒂都是独善其身的典型，他们既无力，也不敢反抗邪恶势力，又不愿和它同流合污，只得独善其身，以保持自己善良的本性。而《双城记》中的律师卡顿，《荒凉山庄》中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私生女伊丝特·萨姆森则是舍己为人的典型。法国革命者不放过贵族后裔达奈，把他当作流亡贵族判处死刑。相貌和他酷似的律师卡顿热烈地爱着达奈的妻子露丝，这种爱是无私的、纯洁的。他为了成全自己所爱的女子的幸福，主动顶替她的丈夫上断头台。私生女萨姆森心地极其善良，同情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乔的不幸遭遇，在乔患病无处安身时，把他带回家，让保姆查理服侍他。乔不愿给他们增添麻烦，悄悄逃走了，但查理已染上了他的病。萨姆森细心照料查理，待她病愈，她的病又传染给了萨姆森。这病虽没要萨姆森的命，却毁了她的美丽容颜。可是，萨姆森对自己的慈善行为一点不后悔。

不管是“独善其身”，还是“舍己为人”，都是圣诞精神的延续，是坚持道德理想、固守精神家园的表现。这些形象表明，即使在面临重重黑暗包围，遭受严重的挫折时，狄更斯也没有放弃人道主义理想。

四、人道主义赋予狄更斯创作张力和魅力

人道主义思想不仅赋予狄更斯创作难以消解的张力，而且赋予狄更斯创作不朽的魅力。

狄更斯创作中难以消解的张力，源于狄更斯的人道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狄更斯希望按照自己的人道主义理想来重塑人们的道德面貌和民族精神。

这体现了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文学大师的开阔胸襟和远大抱负，但是，由于他的人道主义理想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某种虚幻性，难免与现实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极其尖锐、难以调和的。比如，狄更斯希望通过富人的善举消除社会灾难，拯救奥利弗·特威斯特（《雾都孤儿》）和乔（《荒凉山庄》）一类可怜无告的孤儿，但是作品中的善良绅士布朗洛只救了奥利弗，而无法让贫民习艺所中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孤儿获得解放。《荒凉山庄》中仁慈的女管家伊丝特·萨姆森只能缓解流浪儿乔一时的痛苦，而无法改变乔和千千万万流浪儿的悲惨命运。又如狄更斯幻想通过冷酷自私的资产者个人的挫折和善良人士的情感教育使他们幡然醒悟、洗心革面，实现人性的复归。但是，《圣诞颂歌》中的斯克鲁奇和《董贝父子》的董贝的转变只能说是特定的文学氛围中想象的产物，很难说是客观真实的真实反映；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倒是《艰难时世》中那个谎称自己白手起家，鼓吹自由竞争、机会均等的工厂主、银行家庞得贝。他是个“硬心肠、铁拳头”的资本家，尽管工人斯蒂芬向他陈述工人的苦难，恳求他对工人要有仁爱之心和谅解精神，但是，庞得贝不但不为他的诉苦和苦口婆心的劝说所打动，反而把他当作居心不良的家伙解雇了。

狄更斯在创作中展现的人道主义理想和丑恶现实是泾渭分明的、对立的两个世界。尽管作者以幻想手法竭力消除二者之间的壁垒，让读者觉得从黑暗走向光明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世界是充满希望的，但是，虚幻的、灿烂的霞光难以掩盖刺眼的、丑恶的现实，二者之间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实际上显示了狄更斯心灵深处的困惑、迷茫和无奈。

尽管如此，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赋予狄更斯创作不朽的魅力。正如英国著名的狄更斯研究专家汉弗雷·豪斯所说：“毫无疑问，狄更斯的仁慈和愤激的情绪迎合了时代的需要，深深地影响了千千万万人对社会问题的情绪和态度，尤其是在40年代。他是被纯朴的人民广泛阅读的唯一伟大的英国小说家。他的仁慈的特殊形式是他的时代造就的。看来很可能，他的作品现在被